

《骑兵军》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自我建构以及叙述可靠性分析

俞 航

(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提 要：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在《骑兵军》中以戏剧化的人物叙述者代替了全知叙述者，叙述主体意识分裂，隐含作者的意图更加复杂隐蔽。柳托夫是本书中最具特色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贯穿始终，叙述话语覆盖哥萨克和犹太人。在叙述所见所闻的过程中，柳托夫的个人形象和主体意识也在文本中凸显，十分鲜活。而其可靠性问题也是受叙者探知隐含作者真实文化态度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隐含作者；第一人称叙述；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以苏波战争（1920—1921）期间在布琼尼领导的第一骑兵军中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骑兵军》。该作品以悖论式的艺术风格，凝练的语言表达，震撼的场面描写，深刻的内心刻画为巴别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骑兵军》中充满了无法调和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是犹太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犹太文化的衰弱与苍白，以及文本中流露出的对这种文化的浓厚眷恋。另一方面，与犹太文化相对的，是哥萨克冒险的、大胆的、凶狠的，甚至残暴的本性。但这一群体身上又有着源于肉体活力的一种高贵，叙述话语中羡慕与钦佩之情显而易见。然而作为一名崇尚精神生活与维护个人尊严的犹太知识分子，巴别尔无法对哥萨克假借革命的名义肆意杀戮，无限释放人性之恶视而不见。该作品创造出一个充满了激烈矛盾的文本世界，正如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所说，巴别尔最重要的艺术技巧就是用同样的语调描述星空和淋病。

在小说叙述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叙述事实本身，还有作者所采用的叙述方式。巴别尔以出色的叙述技巧将丰富的主题内涵与激烈的思想斗争通过文本表现出来。复杂的叙述立场将作者的思考编织进了文本肌理之中。《骑兵军》中，巴别尔并非采取传统的全知叙述视角，而是安排了不同的叙述者，通过人物有限视角来展示战争的斑驳画面，而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则隐藏在诸多人物纷繁复杂的观点之后。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分析的：“通过那些与‘意义’、‘价值’无关的事件描述，巴别尔似乎在告诉我们尽管他知道一切，但他并不解释，也不打算做价值判断，而是让故事自己讲述自己，或者由一个声称毫无个人喜憎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然而，当我们长时间被这种精致的疏离技巧欺骗之后，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到底打算做什么。”（Lionel Trilling 1987: 28）

在众多的人物叙述者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尤其引人注目。在以柳托夫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述模式中，隐含作者通过“我”这一面具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骑兵军》中，柳托夫并不是唯一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但是他贯穿始终，并在三分之二以上的叙述话语中担当叙述者。因而“我”——柳托夫不仅仅是隐含作者采用的某一叙述者，而是已经成为《骑兵军》叙述话语的结构要素。本文拟通过分析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的叙述话语，对其叙事特征进行探讨，以展示隐含作者的意图。

2 “我”：戏剧化叙述者柳托夫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作家遵循着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革新作品叙述技巧的道路，更多地以人物有限视角来代替全知叙述视角，人物对事件的反应代替事件本身成为叙述的中心。叙述主体的意识不断分裂，隐含作者¹的观点不再集中体现于某一叙述者。1961 年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第一次提出“戏剧化的叙述者”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那些最缄默的叙述者，一旦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时，或像福楼拜那样，告诉我们说，当查尔斯·包法利进来时，‘我们’正在教室里，他也就被戏剧化了。许多小说把叙述者完全戏剧化，把他们变成与其所讲的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特里斯特拉姆·香迪》、《追忆似水年华》、《黑暗的中心》、《浮士德博士》）。在这样的作品中，叙述者与创造他的隐含作者往往根本不同。”（W.C. 布斯 1987：170）戏剧化叙述者的出现是叙述主体意识分裂的必然结果，这使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更为隐蔽。全知叙述因为有随意变换叙述视角的特权，往往掌控整个故事。而戏剧化叙述者的特征是形象鲜活，有时介入故事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同时由于叙述者道德水平、智力程度等各不相同，以及视角本身受限，其叙述往往是片面的，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文本来分析隐含作者通过这些戏剧化叙述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在《骑兵军》中，“我”——柳托夫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叙述者，机械地将故事传达给受叙者，而且是故事的参与者。所以“我”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通过自身叙述所用词汇以及在故事话语中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自己的形象。当受叙者将文本中有关柳托夫身份的信息收集起来时，会发现“我”是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知识分子，目前则是红色骑兵军的一员。比如《我的第一只鹅》中“我”回答六师师长萨维茨基的问题：“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而萨维茨基则回答：“原来是喝墨水的，还驾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巴别尔 2004：45）再如《拉比》中，穆泰拉比问“我”：“这个犹太人从哪里来？”而“我”回答：“从敖德萨。”而当回答拉比“你做何营生”的问话时，“我”则回答：“我正把《奥斯托罗波尔的赫尔撒历险记》改写成诗。”这里叙述者是否可靠有待商榷，但从这些自我展现并结合其他主体话语，栩栩如生的戏剧化叙述者“柳托夫”便跃然纸上。

“我”除了代替隐含作者叙述故事之外，也在展现自身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这一戏剧化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情感。柳托夫时常用饱含感情的语调袒露心扉，受叙者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首先是“我”对犹太文明的眷恋与批判。柳托夫深深羡慕哥萨克的男性气概，用史诗般的语词描述哥萨克壮丽的行军。然而他的叙述话语时不时转换至对犹太文明的哀叹，在揭露犹太文明的衰败同时，也表现出依恋之情。如《基大利》中“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则将柳托夫的犹太身份清晰地展现出来。“每逢礼拜六前夕，总不由得提起旧事，于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便折磨着我的心。”（巴别尔 2004：39）回忆将受叙者带入第一人称回顾叙述中去，在这一视角中柳托夫采用往事中的那个尚未成熟幼年时期“我”的眼光。这个幼年的“我”生长于浓郁的犹太文化中，所见情景如此：“我的祖父就用他那部焦黄的大胡子去摩挲伊本埃兹拉的书，戴花边头饰的老婆子则把瘦长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蜡烛上占卜，幸福地放声号哭。”（巴别尔

2004: 39) 虽然这是幼年柳托夫的眼光, 但声音却是叙述者的声音: “而我那颗孩童的心便会像着了魔的浪涛上的一叶扁舟, 剧烈地晃动……” (巴别尔 2004: 39)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我”对犹太文化的深深热爱。开篇第一段之后, 叙述转移到现实中的人物“我”的经历, 即由第一人称回顾式转为第一人称经验式的叙述视角。然而开篇带有强烈情感的叙述声音并未消散, 而是萦绕整个叙述话语。童年时期那个“我”着了魔般剧烈晃动的情感在现实中“我”身上存有痕迹。因此此时人物“我”虽然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战士, 却依然在日托米尔市转来转去, 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²。这样的寻找承载了柳托夫回忆往事时浓厚的情感, 这种情感化作犹太商人基大利那副烟色眼睛所抛来的一缕缕丝带将人物“我”盘住。当“我”与犹太商人基大利进行话语权的博弈之时, 对犹太人而言极为神圣的星期六降临了, 结束了这场两个人的独白。“老头儿住口了。这时我跟他看到第一颗星出现在银河边。” (巴别尔 2004: 45) 只有同为犹太人, 才知道这颗星星意味着什么, 此时, 童年时期“我”着了魔般晃动了心灵再次震撼了成年之后的叙述者“我”, 柳托夫的犹太身份再次清晰地显现。尽管如此, “我”只是说: “您上哪儿去弄一块犹太人的蜜饼儿和一杯犹太人的茶来, 再在茶杯里稍稍加点儿那位已经退位的神? ……” (巴别尔 2004: 45) 这一叙述声音中微微的嘲讽与第一人称回顾式视角中感伤、深沉的叙述者构成了对比与映衬, 体现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复杂性。

其次, 在讲述哥萨克的故事时, “我”也是一面叙述故事, 一面表现自身。柳托夫是卷入种种事件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旁观者, 在更多的情况下带着与哥萨克不同的世界观来叙述事件。经过“我”的主体意识的过滤, 受叙者看到了以“我”的眼光描写的一切。《我的第一只鹅》中, “我”用夸张的语调描写了萨维茨基的雄性美。“我”在这些一往无前, 甘冒风险, 集霸气豪气匪气于一身的哥萨克战士身上看到了犹太民族所缺乏的生命力, 以及他所向往的充满生命力的原始风范, 因此在“我”的叙述中将哥萨克神化了, 把他们描写成英雄。这时叙述的整体基调昂扬向上, 凸显史诗般的英雄主义, 表达了叙述者的赞扬。然而与此同时, “我”的夸张语调与极具色彩感的用词 (如歪戴的紫色小帽) 也隐含着对萨维茨基“浮夸”特性的讽刺。当萨维茨基在签署歼敌任务的命令时用的是“带花尾”的签名方式, 而签名完之后他看着柳托夫, “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而这命令关乎残酷的战争以及他人的生死: “一并交由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 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但他“双眼中的欢跳”以及“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将萨维茨基从战争的残酷中抽离, 体现出他及时行乐以及事不关己的态度。另一方面, 当“我”的声音与哥萨克人物的声音被置于同一文本中, 形成了一种对比与映衬, 体现出主体意识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使“我”对哥萨克的态度与哥萨克的形象同时凸显。例如在《契斯尼基村》中, 哥萨克首领伏罗希洛夫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史无前例的政权正在古老的首都莫斯科奋力斗争。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命令你们, 战士们和指挥员们, 去进攻敌人, 获取胜利。” (巴别尔 2004: 176) 战士们应和演说呐喊着, 并行进着, 但是叙述者“我”随后表达自己感想: “然而在哥萨克的呐喊声中我听不出戮力同心的精神状态……” (巴别尔 2004: 76) 从与描述相反的评价看出“我”对哥萨克不仅是赞美, 还有怀疑。这种矛盾心理和复杂立场使“我”的感情思想与个性特征逐渐鲜明。《意大利的太阳》中, “我”认为同屋的哥萨克西多罗夫是个“终日愁肠百结的杀人者”, “思想健全的疯子”, “我”自述为时刻被月光般的忧愁包围的怀乡人。之后“我”偷看了西多罗夫的信, 信的内容使受叙者知道哥萨克西多罗夫在战争中同样是无助、寂寞、空虚, 他将一个永远都看不到这封信的女人当作倾诉对象, 并渴望着意大利的太阳和真正的生活。这时, 叙述者“我”的哀愁与哥萨克西多罗夫的哀愁连接并互相强化, 使战争大背景下个人的无助与凄凉更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样, 不同主体意识的意见相左, 使叙述意指过程戏剧化, 叙述内部关系紧张而复杂。

3 巧设的“我”：可靠与不可靠叙述

自从韦恩·布斯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e）以来，这一概念一直被看做通过文本分析来探寻隐含作者意图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范畴之一。“我们将按照作品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说话和行动的叙述者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称为不可靠叙述者。”（W.C. 布斯 1987：170）这一经典定义在叙述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的细化和修正，因为隐含作者的规范本身的探寻即有赖于叙述可靠性的分析，阐释的循环使我们在分析可靠与不可靠性的过程中诉诸于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的综合。同时新叙述学者们通过三条轴的分析将这一复杂现象的感知精细化。詹姆斯·费伦与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在合作的论文《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中将不可靠性分为三条轴：事实/事件、价值/判断以及知识/感知，并得到六种不可靠性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和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因此，一个特定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可以表现为三条轴的不同结合方式，可以表现在其叙述过程中的不同时刻。许多复杂的叙述者栖居于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之间的宽阔地带。巴别尔笔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属于有限视角，加之作为戏剧化叙述者所拥有的生动个性，因而其可靠性较为复杂。通过柳托夫时而可靠的，时而是有限的、可靠性不足的叙述，隐含作者传达这个人物在某些时刻的伦理困境和情感矛盾，从而通过该叙述行为表现蕴含在作品中的价值判断。

大部分情况下，柳托夫作为第一人称有限叙述者，其叙述时所用那种饱含个人情感的语调 and 用词并未使受叙者怀疑其所叙之事的真实性以及其价值判断的可靠性。尽管有时柳托夫会叙述一些他事实上并未看到的事情，例如《契斯尼基村》中萨什卡与哥萨克男孩斯捷普卡关于马之间的交易。在叙事阶段，至关重要不是柳托夫如何了解这些他并未看见的内容，而是让这些场面叙述出来，并让它所包含的信息作为权威传达给受叙者，同时也使柳托夫在上述情况下成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然而，同故事话语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同时存在，柳托夫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法国叙述学家托多洛夫指出：“在‘我跑’这句话里，有一个陈述出来的言语行为主体，插在话语主体与言语行为主体之间，并且从各自身上都取了一部分先前的内容，使话语主体和言语行为主体都不致完全消失，而只是隐匿起来。”（托多罗夫 2004：211）当第一人称“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时，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叙述者功能与人物功能有时独立运作，有时又相互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靠性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整个叙述进程中有着波动。“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将是可靠的和权威性的……当人物和叙事功能相互依赖地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叙述者获得特权的程度也将随他与所述行动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戴卫·费伦 2002：78）而在第一人称叙述中，随着可靠与不可靠的变动调整，细微的叙述变化蕴含着隐含作者所要表达的信念与观点。例如《拉比》中柳托夫混迹于破落的犹太人之中，当他回答拉比“做何营生”的问题时，说道：“我正把《奥斯特罗波尔的赫尔撒历险记》改写成诗。”读到这里，从作品本身建立的结构和规范来判断，受叙者不免会感知到“我”在这里似乎说了谎话。而从最后“我”的自白来看，我对拉比确实撒了谎。“和基大利分手之后，我回火车站去。火车站上，第一骑兵军宣传列车上数以百计的灯火、电台神奇的闪光、印刷机执着的转动和我给《红色骑兵报》那篇尚待完成的文章正在等待着我。”（巴别尔 2004：52）叙述者在这里前后不一致，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身份做了误报，但这并不能看做叙述者“我”不可靠的证据，从而怀疑“我”的一切叙述。因为根据可靠性的三条轴，这一叙述中，柳托夫在价值轴和感知轴上是可靠的，而且事实报道的不可靠是基于隐含作者反讽的需要：即对犹太文明静滞的“怒其不争”的批判。犹太拉比所用句式的整饬，所言之事的形而上性质与事实上犹太文明的衰落（穆尔德海夫子的行为是庸俗低下的）在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反讽效果。为了巧妙地完成嘲

讽，隐含作者让柳托夫在这里讲了谎话：柳托夫所言之事与所做之事同样存在差距。这种不可靠性扩大了犹太文明的实际状况与理想状况之间的鸿沟，而正是这一鸿沟，是隐含作者希望通过哥萨克的生命力来填补的。

在《泅渡兹勃鲁契河》里受叙者则面临着可靠性的另一种复杂情况。在开篇“我”融入“我们”，用史诗语调叙述了哥萨克浩浩荡荡渡河之后，叙述转移至作为个体的“我”在犹太家庭中的经历。在这些被劫掠的犹太人家中，“我”看到：

……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了，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掳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巴别尔 2004：52）

这个家庭中有一个骨瘦如柴怀孕的犹太妇女，两个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而第三个犹太男人则“贴着墙在蒙头大睡”。随后“我”被安排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在对犹太家庭的描述中，我们可推知叙述者“我”尽其所能做到了可靠，无论是事实轴还是价值轴。问题是随着叙述的展开，受叙者才发现因第一人称经验式叙述视角受限，“我”其实并不知道那个蒙头大睡的犹太男人是谁。随后柳托夫在梦魇中被犹太妇女叫醒，她说：“您在梦里又叫又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那个角落，省的您踢着我爹……”即使到这里，“我”依然不知犹太妇女的爹早已被杀，最后掀开被子，叙述者才看到那个“蒙头大睡”的犹太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被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铅块”。在这里柳托夫身上叙述功能与人物功能兼具，既是可靠的，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判断可靠性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轴和价值轴上，还应该考虑到感知轴的存在。通过检查“我”身上叙述者功能与人物功能之间的波动，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我”的读解是不充分的，即我在感知轴上并不可靠。因为当“我”的视角转向窗外的月亮时：“我”被一种朦胧的乡愁所笼罩，同时在梦中被战争的鲜血和杀戮的恐惧所包围。这番自我剖析使受叙者感受到柳托夫虽然可以暂时被战争的雄壮所吸引，但是在内心深处始终无法直视鲜血淋漓的残酷画面，可如此敏感的他却没有注意到那第三个犹太男人的真实情况。骑兵军一员的身份使“我”无意识地抵制自身的感情，抵制自身对犹太人遭受劫难的同情，因而想当然地去理解所见之事。换句话说，是柳托夫的人物角色使之无法敏锐地感知犹太妇女丧父的悲痛。因为在人物柳托夫身上，布尔什维克与犹太人这两种主体意识之间争斗更为激烈。正是在这一博弈中，叙述是否可靠之复杂性得以体现，而这一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平衡正是隐含作者的策略。随后，叙述话语中犹太妇女抖动被子这一家常平静举动与她“声震屋宇”的质问却将犹太人外在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内心世界的对比凸显出来：生活的悲惨并没有磨灭犹太人对爱的执着，也无法抵消他们对战争的质问。即使父亲早已死去，犹太妇女也绝不会忘记父亲死前最后的要求以及临死时对她念念不忘。哥萨克骑兵军泅渡兹勃鲁契河那壮丽的场面与犹太个体的悲惨境遇鲜明对比，而布尔什维克“我”对战争中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个人的遭遇视而不见。这里叙述视角受限的运用体现了“我”叙述事实的有限性，而当真相被揭示之时，犹太妇女的质问声震屋宇，犹太人遭受的屠杀与军队渡河的画面同样震撼人心。柳托夫这一叙述者的复杂性，即同故事叙述允许人物角色与叙述者角色不完全一致，这将有助于隐含作者实现更大的叙述目的，同时也展示不一致性运作本身的魅力。

4 结语

巴别尔用他的笔将犹太文化源于精神与宗教的沉重思绪与哥萨克源于生命与感官的放纵恣肆同时融进了《骑兵军》之中。因此，犹太文化与哥萨克文化的冲突、文明与自然的碰撞是他作品的主题与精髓。同时，《骑兵军》无疑是叙事的艺术，而第一人称叙述者柳托夫则是该书重要的叙述者。柳托夫是一名戏剧化的叙述者，通过他的意识过滤，受叙者看到了作者对犹太

文明和哥萨克文明充满个性和饱含情感的读解。而叙述者自身的形象也通过各种手段勾勒出来，鲜活地呈现于受叙者眼前。而在同故事叙述中，柳托夫身上叙述者功能与人物功能之间的互相影响，使其可靠性较为复杂，而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细微的变化取得了特殊的叙述效果，并成为隐含作者的叙述策略。第一人称叙事出色的艺术效果将《骑兵军》的文本世界在对立与悖论中展现。

附注

1 《小说修辞学》第一次提出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 , 但赵毅衡认为这个翻译有问题, 因为 implied author 指从整本书中推知的作者, 因此应该是 deduced author , 应该翻译为推指作者或者至少翻译为隐指作者。笔者同意赵毅衡的看法, 但隐含作者的术语已为学界所接受, 因此不便更改。

2 这颗星星是犹太安息日的标志。

参考文献

- [1]Harold Bloom(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Isaac Babel*[M]. N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 [2]Lionel Trilling. "The Forbidden Dialect" in Harold Bloom(eds), *Introduction to The Collected Stories*[M], NY: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
- [3]伊萨克·巴别尔. 骑兵军 (戴骢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 [4]W.C. 布斯. 小说修辞学 (华明、胡晓苏、周宪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5]戴卫·费伦. 重新审视可靠性: 尼克·卡拉韦的多重功能[A]//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 (陈永国译)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6]戴卫·赫尔曼主编. 新叙事学 (马海良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7]滋维坦·托多罗夫. 诗学[A]//符号学文学论文集 (赵毅衡编) [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Tactics of Implied Author: an Analysis of Self-construction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irst-person Narrator Lyutov in *Red Cavalry*

YU Ha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Russian writer Isaac Babel uses a dramatic narrator to take the place of an omniscient one and it features the split consciousness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The inten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hidden. Lyutov is the most impressive first person narrator throughout the whole novel. His narrative discourse covers both Cossack culture and Jewish culture. In narrating what he has seen and heard, his personal image and subjectivity are vividly highlighted. Besides,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his reliability is the important way for implied reader to find out the true cultural attitude of implied author.

Key words: implied author; the first person narrator; reliability

作者简介：俞航（1987—），厦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向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2-26

[责任编辑：刘 锟]